

“涨”字背后有何蹊跷？

——代表委员解析物价“三大矛盾”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委员认为，“表面上看农业丰收了，食品价格不存在大幅涨价的基础条件，之所以出现急剧攀升，与去年的投机炒作、一直以来粮食生产结构性弊端，以及调控预警相对滞后都有关系。”

那么，如何为百姓餐桌“减负”？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委员认为，“控物价”与“增收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特别要避免中低收入群体陷入“收入跑不赢CPI”的尴尬。

“政府还要完善市场调控和监管，消除季节性、结构性农产品短缺，严防投机炒作。”四川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委员说，“同时还应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代替散户种植模式，提高供给能力和竞争能力。”

涉足食品行业的天津华明集团董事长刘乃兰委员已年近七旬，她常常逛菜市场，也感觉当前物价偏高，她道出了“成本上涨”刚性拉高物价的无奈。

“糖价从十年前每吨1000多元涨到4000多元，另外人工、水电等其他成本也在上涨，食品厂生产的冰激凌出厂价虽提高三

四毛钱，但依然利润微薄。”刘乃兰委员说。融资遭遇“趁火打劫”，也是企业转嫁和推高产品价格的重要因素。天津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告诉记者，由于银根收缩，贷款指标竞争激烈，银行变相“抬价”导致企业融资成本大增，企业只能给产品提价。

另一个物价推手是国外“输入性通胀”。欧债危机发酵，大宗商品价格频繁波动，一些国家滥发货币“救市”，对国内物价上涨形成潜在支撑。

“企业的成本变化，直接影响物价走势。”浙江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周晓光代表说，中小微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90%以上，其产品大都是生活必需品，帮助中小微企业减轻成本压力，就是“保民生、控物价”。

郑新立委员认为，应当继续推进结构性减税，降低中小微企业经营成本和融资难度；同时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减少产品提价对物价的冲击。

“成本上涨是一个因素，但企业竞争力最终还是靠自己。”郝建枝代表认为，企业消化成本上涨压力，不能一味靠提价，更要看产品创新和转型升级要效益。

“两头诉苦，中间喊冤”

——如何“挤出”中间降价空间？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等人表示，当前国内蔬菜流通成本占最终菜价的三分之二；国内物流总成本在GDP中占21.3%，而发达国家仅为10%左右。挤压流通成本可为“降价”提供空间。

全国政协委员柴宝成曾做过追踪调查：“菜园子”里收购价每公斤4毛钱、6毛钱的蔬菜，让种植户“苦笑”，但到了市民的“菜篮子”里，却涨到了每公斤2元、4元。

菜农抱怨“卖贱”，市民抱怨“买贵”，中间环节则抱怨“钱难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柴宝成委员认为，蔬菜流通环节多，流通费用高是“主因”。

“除了环节多，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也是主因。”一些物流行业的代表委员说，长途公路运输返程空载率高，利润三分之二缴了过路费和油费，“雁过拔毛”的各种罚款更不用说。

一方面，超市、菜摊的租金随房价攀升水涨船高；另一方面，超市、商场收取名目繁多的进场费、上架费、广告费、店庆费、返利费、促销费、管理费、年节费等，这些最终都成为物价上涨的“推手”。

“企业的成本变化，直接影响物价走势。”浙江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周晓光代表说，中小微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90%以上，其产品大都是生活必需品，帮助中小微企业减轻成本压力，就是“保民生、控物价”。

郑新立委员认为，应当继续推进结构性减税，降低中小微企业经营成本和融资难度；同时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减少产品提价对物价的冲击。

“成本上涨是一个因素，但企业竞争力最终还是靠自己。”郝建枝代表认为，企业消化成本上涨压力，不能一味靠提价，更要看产品创新和转型升级要效益。

“两头诉苦，中间喊冤”

——如何“挤出”中间降价空间？

记者 刘元旭 刘敏 王海鹰
(据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聚焦全国两会 建议

黄海委员：

补贴低收入群体标准需调整

据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记者刘铮南辰)全国政协委员、商务部原部长助理黄海建议，把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调整，与农产品价格涨幅挂钩，而不是与居民消费价格(CPI)涨幅挂钩。

黄海委员指出，低收入群体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高，农产品价格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群体。而CPI包括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消费结构和水平差异很大。对低收入群体进行补贴，以现行的CPI作为依据显然不够妥当。”黄海指出。

黄海认为，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的需要，未来农产品价格上涨将常态化。建议将财政补贴的重点由生产环节调整为消费环节，补贴低收入人群。这样不但可以避免使某些受补贴种类的农产品生产“一哄而上”，而且有助于保持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水平不受影响。

康厚明代表：

伤残农民工维权很艰辛

据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记者张艺朱薇)以农民工身份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康厚明今年最关注维护伤残农民工的权益问题，为的是不再让伤残农民工维权之路走几年。

康厚明在两会上将提交《关于农民工工伤诉讼维权的建议》。他告诉记者，在过去的一年里，他接触了约30名因工致伤致残的农民工，对其中的一部人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调研。他了解到，农民工在劳动中受伤后，时常会遇到企业否认劳动关系的现象，而他们通过法律诉讼维权的程序又太繁琐。

他还建议，统一、简化、细化、公开认定劳动关系、劳务关系、雇佣关系及帮工关系的标准，便于识别和处理。将承揽关系作狭义处理，单位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一般不轻易认定为承揽关系。

他告诉记者，年仅29岁的农民工王其峰，因施工作业造成下肢瘫痪，通过法律诉讼方式维权都两年了，可是司法程序还没有走到一半。王其峰有两个孩子，妻子在家里照顾他，全家失去了经济来源，连生活都困难。

他说：“当人大代表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最光荣的几年。”即使任期满了之后，他也会继续关注农民工群体，继续为这个群体通过各种方式提出建议。

涂建华代表：

为制造业“减负”迫在眉睫

据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记者朱薇张艺)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涂建华呼吁，制造业大国为制造业“减负”迫在眉睫，刚性的政策调控应竭力营造实业致富、技术创新致富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生态，为营造“实体创富的社会氛围”提供必要的行政条件。

“当前我国经济生态环境日趋恶劣问题值得忧虑，产业资本都想拼命挤进与土地、资金等关键要素最近的位置，制造业面临‘空心化’之危。”涂建华说，诸多窘困迫使一些制造业企业中的绝大多数长期在“短期行为”中挣扎徘徊。当前，不少民营中小企业主已心生退意，或另图别径。曾经的进取精神正被“弃船心理”所湮灭。这对国家长期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涂建华说，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一方面，我国制造业仍未摆脱总体质量不高、原创基础能力薄弱、资源与环境耗损较重等“瓶颈”制约；另一方面，制造业企业特别是广大民营中小制造企业普遍受到税负过重、要素价格高企、盈利空间收窄、融资困难等“生死考验”。

“为制造业‘减负’已是迫在眉睫。”涂建华说，建议积极吸取并借鉴英、美、德、日制造业在相同发展阶段的有益经验和做法，注重民间力量对制造业及国家创新能力建设的巨大促进作用。国家出台的“减负”措施既要一般普惠，更有重点激励；既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刚性的政策调控应竭力营造实业致富、技术创新致富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生态，抑制投资暴富和“炒作”经济的生长空间，对垄断行业和暴利行业课征重税，从而为制造企业提供出减税的空间。

拿着自己带到两会的人大代表建议，涂建华向记者列举了三条亟待落实为制造业企业减负的具体措施：一是真正做到对制造企业，特别是中小制造企业“少取多予”，通过减税、减费、减负、取消不合理的税(费)项设置，构建财税支持体系，让制造业企业“休养生息”。二是针对中小制造企业融资难、代价高的普遍问题，建立专门的融资服务体系。三是进一步深化改革，使民间资本和国资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和运营通道。

李健代表：

长江中游应挺起“龙身”

据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记者李鹏翔皮曙初)“若将长江比作巨龙，上海是‘龙头’，重庆为‘龙尾’。从发展现状来看，‘龙头’已经舞起来了，‘龙尾’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动作也不小，而位于长江中游的‘龙身’，似乎相对平静。”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李健在全国两会上建议，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江西应当挺起“龙身”，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抱团放大中部能量，使该城市群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城市群之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引擎。

李健指出，由沿长江呈“品”字形分布的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构成的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是湘鄂赣三省乃至中部地区经济最发达、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目前经济总量已接近珠三角城市群。加快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打造中国经济发展的“第四极”，不仅有利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流域经济带开发，而且对我国已经进入城市群主导区域发展的时代。为了加快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使之在新一轮发展中推动长江流域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增长，李健建议，在三省合作共推的基础上，将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上升到国家层面，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和湘鄂赣三省政府，着手编制《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国家总体战略规划。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城市群主导区域发展的时代。为了加快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使之在新一轮发展中推动长江流域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增长，李健建议，在三省合作共推的基础上，将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上升到国家层面，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和湘鄂赣三省政府，着手编制《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国家总体战略规划。

面对承接产业转移的机遇，携手发展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构筑中部“金三角”，已经成为湘鄂赣三省的共识。今年2月10日，湘鄂赣三省主要领导在长江之滨的武汉签署“共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合作框架协议”，共同致力于三省基础设施、产业、市场、文化旅游和生态保护“五个一体化”建设。三省的交通、旅游、商务部门也分别签订了具体合作发展协议，并建立起定期协商、沟通、交流机制。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城市群主导区域发展的时代。为了加快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使之在新一轮发展中推动长江流域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增长，李健建议，在三省合作共推的基础上，将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上升到国家层面，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和湘鄂赣三省政府，着手编制《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国家总体战略规划。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城市群主导区域发展的时代。为了加快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使之在新一轮发展中推动长江流域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增长，李健建议，在三省合作共推的基础上